

2011 年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2011 年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10 月 29—31 日在武汉、随州隆重举行。来自大陆及港台、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150 多位专家出席了开幕式。开幕式上举行了“中国先秦史学会楚文化研究基地”授牌仪式。10 月 30—31 日与会专家考察了叶家山考古现场、随州市博物馆,并赴炎帝神农故里景区举行公祭炎帝的活动。与会专家围绕清华简、上博简及楚文字、楚国历史与文化、楚简与先秦历史文化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积极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清华简研究。《楚居》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学术热点之一。上海大学谢维扬《〈楚居〉中季连年代问题小议》指出,季连晚出说存在不少疑问,推测季连活动时期有可能存在一个与商朝无关的“盘庚”。清华大学沈建华《从清华简〈楚居〉看丹淅人文区位形成》肯定了丹淅在先秦时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武汉大学晏昌贵《清华简〈楚居〉所见季连徙居地及相关问题》考察了季连时期以京宗为中心的徙居地,并推考了一些季连的活动地。河南大学李玉洁《〈楚居〉记载的季连至鬻熊迁徙与活动地域考述》认为,夏王朝灭亡之后,季连部族又臣服了殷商王朝,在风俗方面还包含这许多殷商文化。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单周尧《读清华简〈楚居〉“渍自胁出”“与巫并赅示胁以楚”小议》根据清华简中《楚居》的部分文字,分析了楚人得名的由来及依据,认为楚人所重者,为其先祖季丽之出生。中国人民银行黄锡全《楚简秦溪、章华台略议——读清华简〈楚居〉札记之二》指出《楚居》简文中楚国的灵王、平王、昭王均跽过的秦溪与安徽干溪不是一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夏麦陵《清华简〈楚居〉中和发渐地望试探》指出《楚世家》与《楚居》在“居丹阳”和两次南征及迁都之事两个问题上的不合。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苏建洲《〈楚居〉简 9 字及相关诸字考释》详细考释了《楚居》简 9 的文字。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尹弘兵《〈楚居〉中楚先祖的年代问题》探讨了清华简《楚居》所载楚先祖季连、穴熊、丽季的年代问题。清华大学牛鹏涛《试论清华简〈楚居〉之古史观》指出,《楚居》记述古史时呈现宁付阙如的谨严态度,不语怪诞的理性精神和直书不讳的信史风格。长江大学卢川《清华简〈楚居〉与早期楚人迁徙》详尽列举了楚早期所迁的地名。陕西师范大学王伟《由清华简〈楚居〉“秦溪之上”说起》指出了简文中的秦溪之上和研究者认为的《左传》之干溪之上并不一致。厦门大学周运中《清华简〈楚居〉地理考》对《楚居》中的地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肖洋《〈楚居〉第 12 号简与第 13 号简之间缺失史事的问题》认为《楚居》第 12 号简与第 13 号简之间无法衔接,有待于日后更多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献资料揭开谜团。

《系年》是清华简中的重要一篇。清华大学李均明《伍员与柏举之战——从清华战国简〈系年〉谈起》结合《系年》第十五章,解析了伍员本人及其在柏举之战中的作用。北京大学董珊《清华简〈系年〉所见的“卫叔封”与“悼折王”》认为卫康叔应是先受封于康,又迁于卫,悼折王之名号应为“折王”。三峡大学袁金平《清华简〈系年〉“徒林”考》认为,“徒林”即先秦古籍

习见之“云梦”。

关于《耆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辉《一粟居读简记(二)》对竹简《耆夜》的命名依据做了分析,根据相关文献做了例证。南开大学朱彦民《清华简“武王勘黎”考辨》认为《耆夜》简文纠正了《尚书大传》、《史记》以为伐黎为文王时事的传统说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常耀华《从〈耆夜〉“饮至”看商周之出行典礼》结合传世文献、卜辞、简文对商周出行典礼进行了梳理。复旦大学郭永秉《清华简〈耆夜〉诗试解二则》对《耆夜》中的两篇诗句“我忧以鬯”和“月有成,岁有行”进行了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志平《清华简〈耆夜〉中与音乐有关的术语“终”》对《耆夜》的几首乐诗中“终”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得出终和章、竟、成都有乐曲完成、终了之意。浙江大学曹建墩《清华简〈耆夜〉篇中的饮至礼考释一则》对简文中的燕饮礼仪做了分析。

关于《尹至》,中国社会科学宋镇豪《谈谈商代开国名臣伊尹》结合清华简中的《尹至》详细论述了伊尹对商代建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美国达慕思大学邢文《〈尹至〉“夏有祥”小议》对《尹至》第三简“夏有祥”前的简文进行了重新释读。

学术界对清华简《皇门》、《金縢》、《程寤》、《保训》等篇亦从不同角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澳门大学杨兆贵《清华简〈皇门〉与〈逸周书·皇门解〉篇校释》指出简文《皇门》对研究周公的思想、周初周人推行的政策、了解周初政治形势等,很有参考价值。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清华简〈金縢〉有关历史问题考论》结合相关文献对《金縢》竹书本和传世本细加考析,说明武王开国在位三年、周公居东即东征等说法是真实可信的。清华大学陈颖飞《清华简〈程寤〉、〈保训〉文王纪年探研》结合“文王称王”的其他资料,对《程寤》“佳王元祀”、《保训》“佳王五十年”的写定年代做了界定。上海师范大学刘光胜《礼与刑:清华简〈保训〉文王传“中”的两个维度》指出《保训》之“中”与上甲微之“中”字形虽然一样,但意思并不相同。东海大学朱歧祥《由金文字形评估清华藏战国竹简》认为清华简有补充发挥现有文献内容的可能。

二、上博简及其他楚简研究。上博简于1994年由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共1200余枚,均为战国竹简,内容涉及儒家、道家、兵家以及杂家等,共80种古籍。苏州大学周书灿《上博简〈容成氏〉九州补论》指出上博简《容成氏》所记九州极有可能是战国时期发生于今黄河下游鲁地一带自成一系的古老传说。安徽大学刘信芳《竹书〈凡物流形〉试解六则》对目前学术界关注的竹书《凡物流形》在字形分析、字词训释方面的几处疑难做了分析。玄奘大学季旭升《〈上博五·鲍叔与隰朋之谏〉“量之以鬲洁”解》指出《上博五·鲍叔与隰朋之谏》中学术界对“量之以鬲洁”的解释还不是很明朗,并进行了讨论。安徽教育出版社鲁金良《〈鲍叔与隰朋之谏〉与〈荀子〉对读》指出《鲍叔与隰朋之谏》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并将几段简文与《荀子》做了对读。北京交通大学孔德立《新出楚简的历史失忆及思想史意义——以上博楚简〈鲁邦大旱〉为例》以《鲁邦大旱》彰显的孔子“神道设教”的思想为起点,分析《鲁邦大旱》失传的原因,推进了对新出楚简的历史失忆及思想史的研究。吉林大学单育辰《〈昭王毁室〉的再研究》对“上博四”《昭王毁室》还存在的疑点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西华师范大学赵炳清《〈仲弓〉篇中孔子的思想探析》指出上博楚简三《仲弓》篇包含的孔子“以民为本”思想与传世的相关经文相比无疑是更加的真实和全面。

本次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另有论及郭店楚简、新蔡简、包山楚简、望山楚简、九店楚简等简

文。陕西师范大学王晖《论早期儒家的“智圣说”》根据郭店简《五行》篇探讨了早期儒家的重要思想观念:仁、义、礼、智、圣。重点讨论了认知范畴的“智圣说”。浙江大学贾海生《郭店楚简〈六德〉所言丧服制度》认为郭店竹简《六德》所言丧服制度,仍有问题值得讨论。长江大学徐文武《从新蔡楚简探楚族的起源》指出河南新蔡葛店楚墓出土的楚简文字对探索楚族起源与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南开大学陈絜《竹简所见战国时期楚地居民的里居形态》认为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基层聚落的居民,主要依照地缘关系编定,血亲等因素或许已不在优先考虑之列。武汉大学刘国胜《望山楚简名物考释(二则)》对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的146号简上的文字“笋”、“辘”进行了考释。华中师范大学黄尚明《楚简中祭祀用玉问题探索》对楚国祭祀用玉问题进行了综合探索。湖北大学吴成国、王佳《楚简所见祈求巫术述论》探讨了楚简所见祈求巫术。武汉大学杨华《楚简札记三则》对九店楚简中的门膚、芳粮、白羽之戩作了考释。

三、楚文字及其他文字研究。故宫博物院林小安《古文字“𠂔”字考辨》对新出土的战国时期铜砮码上的三个铭文进行了考辨。安徽大学徐在国《谈楚文字中从“胖”的几个字》对战国文字中从“胖”的一些字做了分析。李天虹《〈孔子见季桓子〉字形简析》指出《孔子见季桓子》篇的字形比较特殊,主要体现在通常写法基础上,笔画有所偏移、改写、分离、连写、添加、简省、润色等。贵州师范大学吴国升《春秋时期楚系文字地域性特征字形举隅》在以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整理编排和增删订补。武汉大学萧圣中《曾侯乙墓竹简与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竹简中的“争”字》对曾侯乙墓竹简中一个从日从力从市的字进行了重新界定。三峡大学王祖龙《楚简帛笔法与隶变》从书写本身出发,综合分析了楚简笔法生成的历史因素。另《基于曲线字库技术的楚简帛文字字库的制作》则探讨了基于曲线字库技术的楚简帛文字字库。河南大学张新俊《据新出楚简谈谈甲骨卜辞中的“𠂔”、“围”等字》依据新出土的楚简对甲骨卜辞中的部分字做了考释。武汉大学文学院罗积勇、周丽霞《“埋”字形义考》认为“埋”有二义:一为掩埋、埋藏;另一义为埋祭,亦掩土而埋牲。华南师范大学白于蓝《金文校读三则》以金文为例,指出古文字的考释具体字义的解读尚有大量工作可做。

四、楚史与楚文化研究。楚史与楚文化是本次会议研讨的主题之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笪浩波《汉东的国、曾国与随国考》通过对今年考古资料的梳理,对卜辞和铜器铭文中的国、曾国进行了考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凡国栋《随州叶家山新出“𠂔子鼎”铭文简释》对鼎铭做了考释。河南大学黄锦前《由楚系铜器铭文中的“吉日”选择观念看东周时期楚文化的变迁》从习俗的角度揭示出了东周时期楚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四川大学李世佳《“楚屈子赤角簠”新研》指出学界多认为的楚系青铜器“屈子赤角簠”的作器者“屈子赤角”为《左传》记载的楚“息公子朱”的观点还值得商榷。清华大学赵平安《〈吴越春秋〉“徙于菡若”考辨》认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徙于菡若”中“菡若”不仅不误,而且渊源有自。陕西理工学院梁中效《楚国“汉北”的战略地位述论》指出楚国的“汉北”既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更是楚国抵御秦、齐等中原大国、屏障江汉的战略基地。湖北大学宋公文《息夫人论考》探讨了息嬀入楚后心路历程的改变以及她心系楚国命运和对楚国历史发展的贡献。重庆师范大学刘俊男《关于楚史的几个问题》对夏商时期的楚国地位,周代以来楚国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做了进一步的讨论。武

汉大学陈抗生《郢城鬬氏春秋》试图从族脉上探寻古郢都的地理位置。武汉大学郑威《楚阳君、彭城君、夏侯封邑地望考》对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记的数名楚国封君的封邑地望逐一进行了考述。

贵州大学张闻玉《道县石像群之解读》认为湖南道县石像群堪称世界又一大奇迹。四川大学彭邦本《楚文化西渐与川东春申君故里传说初探》认为春秋时期楚国强大以后,其文化西进势头几乎从未停息过。华东师范大学刘正《楚国历史文化特殊研究——火历及其相关问题的最新研究》探讨了中国青铜时代在若干地区通用过的历法之一:火历。随州市政协包毅国《从地域文化发生发展看地域文化融合》、湖北大学彭忠德《〈柁机〉书名含义:编年史》认为《柁机》其义当是由断木截面之年轮引申为“年”,进而引申为逐年记事之编年史之义,而非戒恶等其他义项。华中师范大学傅玥《鄂西地区西周遗存与早期楚文化》探寻早期楚文化的来源。复旦大学吕静、程博丽《先秦时期楚地所见的“盟”》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楚简就楚地的盟誓进行了分析,初步对盟进行了划分。苏州科技学院叶文宪《论战国后期吴越地区的楚文化》通过对战国后期吴越地区楚文化的研究分析了一个地区的文化是如何随着人群的迁徙流动而变迁的。有关楚文化的论文还有平势隆郎《战国楚王の自称》、高江涛《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西周遗存新发现与早期楚文化问题》、刘伟《春秋时期的天人观念与天人互动——以“楚昭王问观射父”为中心的考察》、蔡靖泉《楚文化西渐的历史考察与文化审视》、丁原植《楚国地域思想与古典哲学渊源的反思》、张丹《河南淅川所出镇墓兽铭文中之人名称谓新考》、赵晓斌《“鼎钟二钧”鼎与“淮阳上官四分”鼎——记湖北荆州谢家桥出土的两件刻铭铜鼎》等。

五、楚国考古学与青铜文化研究。清华大学李学勤《试说叶家山 M65 青铜器》认为见于叶家山 M65 和 M2 的曾侯谏为成康时人,似即周初第一代曾侯。北京大学朱凤瀚《关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国家博物馆所藏楚大师编钟》对耶路撒冷博物馆所藏编钟与铭文的内涵及其涉及到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编钟的问题做了讨论。上海博物馆周亚《虎簋断代与淅川楚墓中的复古现象》认为虎簋仍然应该是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武汉大学张昌平《也论郭店 M1 年代问题》从拔郢的社会背景并结合一些考古学依据做了进一步讨论。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关于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音乐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探讨了音乐文物与其它器物之间的关系。湖北襄阳市博物馆王先福《襄阳楚王城或为楚熊渠所封鄂王城初考》对楚熊渠所封鄂王城的地望进行了初步考证。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何佳《再释虎座鸟架鼓》认为楚墓中出土虎座鸟架鼓造型的文化渊源缘自古代“四象”。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曹锦炎《黄子鼎与瘠子鼎——兼谈黄国与鄢国的地望问题》对出土的黄子鼎与瘠子鼎铭文做了探讨。湖南省博物馆刘彬徽《江汉淮间春秋青铜器研究》对江汉淮间春秋青铜器在年代、文化源流和历史演变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黄敬刚《曾侯乙墓随葬器物礼制考》指出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重器再现了曾国的悠久历史和厚重的礼制文化。

六、商周考古与区域考古文化。郑州大学张国硕《试析商王朝早期疆域变迁的特点》认为商王朝早期疆域变迁具有三个特点。吉林大学吴良宝《战国晚期韩国疆域变迁新考——以兵器刻铭为中心》讨论了战国晚期韩国疆域的变化。复旦大学周波《战国魏器铭文研究二篇》对出土的战国魏器铭文做了考释。武汉市楚文化研究会程涛平《论盘龙城为商王南土行都》认为盘龙城是商王南土行都。重庆师范大学杨华、刘前凤、唐备《长江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文化

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认为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探讨巴文化起源于鄂西、三峡地区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三峡大学陈文武《三峡区域史前美术的研究》认为三峡地区在人类进化史和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华师范大学蒋晓春、白九江、赵炳清《川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初步研究》对川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遗存做了梳理。

七、其他。有关先秦史相关专题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武汉大学杨剑虹《试论齐桓公的经济改革》,荆门博物馆崔仁义《试论老子学说的主要特征》。此外,还有南阳师范学院郑先兴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盗者〉之“盗者”原型猜测》等。

此次研讨会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盛会。众多专家对清华简做了重要的分析,进一步推进与深化了先秦史研究。此次研讨会学术视野开阔,且具有前瞻性。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范围展开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给先秦史研究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提出了新的问题。清华简的问世及相关楚简研究的深入,对先秦史和楚文化研究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陆慧娟)

2011 年陕西西安秦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秦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秦文化学术讨论会”于 2011 年 10 月 21—23 日在西安西北大学召开。50 余位专家参加了此次学术讨论会。

此次讨论会是历史与考古相结合的一次深入探讨,主要采用大会发言的形式,探讨了秦人的蜀道经营、王后陵规制、圣都制度与都城体系、西畴地望、西部文化风貌、汉初政论所塑造的秦形象、周秦时期农商问题、封泥等多个问题,讨论会上还介绍了早期秦文化、秦直道、雍城、秦始皇帝陵园、神禾塬秦陵园、新密古城遗址、坡刘墓地、西汉张安世墓等新的考古发现成果。

此次学术讨论会,学者们对秦文化固有的问题进行了重申或新的解读。如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黄留珠重申了他的“秦文化的二源说”,概括的说是“源于东而兴于西”,所谓“源于东”者,是讲秦人、秦文化的原始发祥地在东方;而“兴于西”者,是讲秦人、秦文化的复兴之地在西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孙家洲《汉初政论所塑造的秦形象》是对《过秦论》中秦文化的新思考,提出汉初政论所塑造的秦的六种形象。另外,因目前只将封泥大略分为战国秦和秦统一,但具体怎么分,至今未统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瑞《秦代封泥断代初步》对目前发现的大量秦代封泥断代问题作了一个归纳分析和验证:有“玺”“印”二字封泥是秦统一前大量使用的;关于封泥中的“大”“泰”类,秦统一前用“大”较多,“泰”为统一后的称谓“丽山食官”、“丽邑丞印”是二世时封泥。

另外,学者们还开拓了秦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秦人的蜀道经营》指出,秦人有重视交通的传统,而蜀道的经营,尤其突出地表现出秦人以交通建设促成政治军事进取条件的成功。蜀道连接了关中和蜀地两处“天府”,为秦的统一准备了条件。